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罗建周

(西安财经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关键词:生活书店;文学研究会;文学传播;《小说月报》;《文学》月刊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141-04

自“五四”以降,至北洋军阀政府结束前夕,文人求仕无门,但思想文化上较为自由,故而形成文人结社的社会环境。朱寿桐分析指出,“文学社团活跃的两个条件”,一是“政治上有所限制”,二是“思想文化上比较自由”^[1]。一些作家自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志趣相投、友情所依、文学倾向基本一致的文学团体,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当时的文学生态十分适宜这种文学组织的发生、发展,所以文学社团得以在文坛遍地开花。正如茅盾在勾勒1920年代文学景况时说:“从民国十一年(1922)到十四年(1925),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2]但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环境发展演变,原有的文学生态、文学秩序被打破,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当局相继出台新闻出版检查制度,颁布国家相关文艺政策,等等。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恶化,文学社团如履薄冰,多个文学社团不欢而散。就连郭沫若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也难逃被查封的劫难。1932年,文学研究会同样面对离散的问题。因《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解散,与其他文学社团一样,固有的作家群体分化,作家不得不暂时退

隐文坛,积蓄力量,谋划着重组或复出的可能。就在文学研究会解散不久,由邹韬奋等人创办的生活书店问世。这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为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交集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接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在学术思想文化与刊物及作家群体间,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即“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较为普遍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以刊物带起思想文化群体,刊物兴则群体兴,刊物散则群体散”^[3]。《新青年》杂志就是可信的例证。显然,这种认为刊物是当时学术、文化、文学的重要维系者的观点是恰切得当的。王晓明认为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讨论,不仅要注意那一代作家的创作,更要注意“五四”时期的报刊杂志和文学社团,注意到它们共同的文学运行机制及内在规范等问题^[4]。在创造社的“孕育”期,郭沫若与张资平等人亲身创办刊物,历经周折,总结“刊”“社”“出版社”三者的关

收稿日期:2016-0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0XXW001)

作者简介:罗建周(1981-),男,甘肃天水人,讲师,文学博士。

系，他们达成一个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是社团的一切。找不到出版社，成立一个空头社团便没有什么意思了。”^[5]较之前者“刊物”与“群体”（社团）二者的讨论，后者将书店（书局、出版社或文化机构）的重要关系拉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无疑是对前者研究的一种推进与深化。

（一）《小说月报》停刊前后

《小说月报》的热心读者暨《文学》月刊当时的编辑人（见证人）黄源有这样一段回忆的文字：“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十年，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毁，《小说月报》停刊，灾后竟不予复刊，因此，郑振铎就酝酿另办一刊物”^{①[6]}。从黄源的回忆来看，《小说月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日寇侵华战争破坏所致。这的确是客观原因之一，但句中“灾后不予复刊”所透露给我们的是商务印书馆不愿《小说月报》复刊，我们可以推测，商务印书馆趁机将其抛弃的嫌疑还是有的。其实，事实本也如此，黄源回忆文字的言外之意，触发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寻味。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3人分别担纲主编的，虽属一份文学刊物，他们同为文学研究会骨干成员，但三者在《小说月报》编辑风格上却迥然不同。沈雁冰重文艺理论批评，郑振铎重“整理国故”有学者研究倾向，叶圣陶专注于文学创作等特点；这其中还有商务印书馆要求调职茅盾，由郑振铎接任《小说月报》的一段插曲。这段插曲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革新的《小说月报》继承了《新青年》传统，在思想、文学上有“左倾”导向，让商务印书馆保守派心烦意乱，尤其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府统制文艺的开展，商务印书馆愈加保守。二是《小说月报》市场销量不见好，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心存疑虑。三是沈雁冰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礼拜六派”借王云五之力向茅盾施压，沈雁冰拒绝接受。随后，王云五派助手检查刊物稿件，因之前馆方与沈雁冰有约在先，馆方无权干涉沈雁冰的编辑方针。从此，一向保守的王云五负责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沈雁冰出现分歧。过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管理时，他是鼎力支持过茅盾的，但随后的王云五调职茅盾，由郑振铎接任编辑事宜。这些看似琐碎的交往关系，却在全面把握茅盾、郑振铎及《文学》月刊相关的人事关系时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二）《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

通常没有研究者会关注《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之间的关系，因为《小说月报》依托的出版背景是商务印书馆，而《文学》月刊则是由生活书店负责出版发行的，它们二者貌似没有必然的联系。加之，二者创刊时间相差较大，虽属于文学期刊，但一般不会对二者联系起来。如果从两份文学大刊背后的支撑者（操控者）或依托的文学社团来看，二者是有很大关联的。大致有两点：其一，二者均是受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体支撑的文学刊物，并且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施展文艺拳脚的重要平台。其二，茅盾、郑振铎等人既是《小说月报》的改革者，又是《文学》月刊的创办者。正如《文学》月刊编者黄源的一段回忆：“《文学》月刊实际上是《小说月报》的继承和发扬。沈雁冰同志于1921年对《小说月报》的革新，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鲁迅先生评为这是《新青年》在文学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我的新文学启蒙老师也正是它。虽然我在中学时代已受许多作家教师如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孙俪工、方光涛、赵景深等的关心培养。但当时中学校里没有教外国文学的，而引导我去爱好19世纪的俄国、法国及弱小民族文学的，是《小说月报》。后来自己能阅读外文时，也是沿着这路线去选读的。”^[6]

黄源还讲述，鲁迅当年编《译文》，仅亲自编辑3期后，放手让他编辑，这其实与黄源早年阅读、学习《小说月报》有关联，如黄源认为这是“沈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给我打下的良好基础”。

作为文学传播者的茅盾，对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的失信尤为愤怒，坚决选择离开商务印书馆，继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开展其文学传播活动。从此，沈雁冰与商务印书馆文化“势力”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与当时有着“稳妥”背景的生活书店走上合作之路。如果要问《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二者的关系，一般认为：较之《小说月报》，《文学》月刊就是流，而《小说月报》则是源；较之《新青年》杂志，

① 茅盾关于《小说月报》复刊事宜的回忆：“一九三三年春节前后，郑振铎从北平回到上海度假（当时他在燕京大学教书）。三月下旬的一天，他来看我。我们谈到现在缺少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像当年的《小说月报》；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写出了作品苦无发表的地方。郑振铎忽然说，我们把《小说月报》重新办起来如何？《小说月报》自‘一二八’沪战而停刊后，已一年多了，未闻商务印书馆当局如王云五之流有复刊的表示。我对郑振铎说：‘你的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也做不了主。商务当局是愈来愈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倒不如另找一家书店来出版。’”

《小说月报》是流,《新青年》则是源。同样,由《新青年》《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这些文学期刊的背后都有自己文人“圈子”或文化出版机构做支撑,如新青年社依托“京师大学堂”文化、学术背景、文学研究会间接依托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依托中华职教社,等等,这些文学期刊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由相应的文学传播者在幕后操控,文学传播者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嬗变同样有着重要作用。作为生活书店精心打造的《文学》月刊,其受《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五四”新文学传统、书店创办人邹韬奋等人的文化追求与价值立场的影响是潜在的,但这些深层的文学生产、传播问题亟待我们给予应有的观照。

二、从文学研究会到《文学》月刊: “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迁移

在现代文学传播史上,“文学社团”“文学期刊”、书店(局及出版社)等都是文学媒介得以正常运作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的核心组织者就是文学传播者。文学研究会原以商务印书馆及其经营的《小说月报》为重要依托,而当商务印书馆在文化经营中借机停办《小说月报》时,文学研究会所维系的作家群体的归属问题,就成了文学研究会成员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王统照等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 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月刊

从时间上看,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在《文学》月刊创刊之前已解散、停办,在客体上不存在交集,但就文学研究会的主体来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群体,核心组织者(发起人、期刊编辑等)等有生力量及文学观念仍然发挥作用,尤其青年作家创作力不减,但没有发文的地方。在文学传播活动中,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月刊二者间实际发生过重要的文学关系,稍作推敲就会发现,其潜在因素是文学传播者的参与。这些因素大致包括原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和胡愈之、《文学》编者茅盾等人的共同努力才促成文学传播的延续。茅盾曾回忆这段经历:“振铎又说:愿意出版《文学》的书店也找到了,就是生活书店,是他约了胡愈之同找邹韬奋谈的。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生活书店这块牌子是比较牢靠的。当时生活书店很有特色,它没有老板,采取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每个职员都有一份股金,实行民主的管理方法,所以它没有老牌书店的那些陋规和弊端,是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目光四射的书店。它又不同于那些随时面临着被国民党查封危险的

‘红色’小书店,而有个可靠的背景——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特别是书店总经理邹韬奋,他是办《生活》周刊起家的,很有才干,很有见识,很有魄力,‘九一八’以后在政治上日益左倾,活动的能量也大。他对于我们办这杂志的目的、方针、内容和政治倾向是清楚的,也是同情和支持的,但表面上采取和我们订合同的形式,声称不干涉我们的编辑事物。”^[7]

随后,茅盾与郑振铎等人商议拟定10人组成《文学》编委会,他们分别是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茅盾,其中鲁迅不露名。拟定的当晚,讨论编委会人员事宜。最后由新成立的《文学》编委会通过主编、编校等人具体的工作。这消息很快传开,《出版消息》刊发两篇“捕风捉影”的文章,把《文学》创刊说成是《小说月报》复刊、文学研究会复出,等等。消息一出,文坛哗然。

从《文学》月刊编委会成员及创刊的重要环节来看,这些人大多是原文学研究会成员,组织、决策层面的人也是原文学研究会成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月刊就是《小说月报》的延续,相伴相随的是文学研究会的主体成员从此逐渐脱离商务印书馆,文学创作和发表的阵地迁移于《文学》月刊,在生活书店的文化事业经营中,集体性开展他们的文学传播活动。

(二)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传播

文学社团要受文学期刊这一文化阵地的支撑。但被誉为文坛第一社团的文学研究会,1932年初期业已成为“空头”的文学社团,创作群体面临分化、解散等问题的干扰在所难免。但由于《文学》月刊接续了《小说月报》,依托生活书店文化经营,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群体暂时退隐于生活书店继续从事文学活动,共同追求文学、文化事业。从1933年7月开始,《文学》月刊创刊号出版、传播,原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发表及维系的生活经济来源等问题有了一些保障,对稳定原文学研究会的创作队伍功不可没。我们同时也要理解,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作家群体的迁移,是“集体的文化形式”^[8]迁移,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群体有过分化、流失等问题,作家群体有离有散,有些作家甚至重起炉灶,有些作家还因种种因素疏远文学创作。

从书店规模、文化资本积累、社会影响力等方面

来看,生活书店虽有“职教社”背景,但还是无法与商务印书馆比肩。文学研究会作为20世纪20年代最大、最早的文学社团,被迫由商务印书馆迁移于生活书店,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文学研究会衰落的表现,因为作家群体的离散消减了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合力,但还是有重要的文学余脉得以传播并持续发展。关于文学余脉传播,正如朱寿桐在文学社团研究中的主张,重点把握社团“集体的文化形式”问题。上文提及文学研究会“集体的文化形式”迁移并退隐于生活书店的简要情况。

那么,对于文学研究会迁移的“集体的文化形式”究竟是什么?从文学研会本体来看,笔者认为大致包括3点:第一,文学研究会以“著作同业公会”为中心的社团运作模式;第二,这种运作模式下的兼容并包主义的文学气度、折中主义的文学态度;第三,“为人生,为艺术”的整体文学倾向。文学研究会的这些运作模式及文学倾向等要素构成的“集体的文化形式”,决定了在全面抗战时期与“左联”余脉的联合,并不像之前一样还是各自坚守文学阵地、充满斗意,而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开创了战时文学传播的新局面。所以,文学研究会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研究会余脉与生活书店结缘,助推了中国文学的生产、传播,在现代文学传播史上同样是一个有意义的新起点^[9]。

三、结语

生活书店经营的大型纯文学期刊《文学》月刊,承续了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坚守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接纳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作家群体,原文学研究会“集体的文化形式”通过生活书店经营的文

学期刊得以传承。生活书店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积聚力量,准备着抗战时期文学的重组与融合;“左联”在血风腥雨的文化“围剿”中受到《文学》月刊及生活书店暗自的扶植和帮助,它们之间发生了隐秘的、潜在的文学交往,“左联”文艺有效地“钻网”,左翼文学得以出版、传播,唤醒了不少爱国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这些复杂、深层的文学与传播的互动,均在文学作品、作家、期刊背后完成的,不常为新闻史家或文学史家重视,但是就像生活书店这样的进步出版机构,对同期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文学风貌的形成无疑具有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朱寿桐.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社团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4(1):120-124.
- [2] 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 [3] 王建辉.“五四”和新出版[J].出版科学,1999(2):9-14,8.
- [4] 王小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J].上海文学,1993(4):65-76.
- [5] 刘纳.社团、势力及其它——从一个角度介入五四文学史[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3):15-26.
- [6] 黄源.黄源文集:第1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 [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4.
- [8] 朱寿桐.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方法[J].文艺理论研究,2005(3):2-11.
- [9] 霍小青.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6):105-108.

Continu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ife bookstore and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LUO Jian-zhou

(School of Art,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06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made by life bookstores to th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1930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origin of *Novel Monthly*

(下转第150页)